

沈如槐 著

清華大學文革紀事

——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

清 華 學 堂

時代藝術出版社

目 錄

第一章 天下大亂

狂飆驟起·····	5
力求理解·····	10
中間偏左·····	13
參加八八·····	19
紅衛戰士·····	24
戰鬥小組·····	26
清華大亂·····	32
南下串聯·····	34
康藏之旅·····	37

第二章 黨內有派

裂痕初現·····	47
縱隊成派·····	54
反擊逆流·····	59
二月整風·····	63
初露頭角·····	67
聯合聲明·····	69
黨員登記·····	74
蒯氏路綫·····	75
無限上綱·····	78
政治綱領·····	81
反攻倒算·····	84
幹部抗爭·····	89
導火之索·····	94

第三章 勢不兩立

揭竿而起·····	100
一條主綫·····	103
主持大局·····	105
爭奪喉舌·····	108
依靠群眾·····	112
兩張表格·····	115
平反黑幫·····	121
保鬥分明·····	124
集體亮相·····	126
兩小撮論·····	130
自力更生·····	133
良師益友·····	135
革籌小組·····	138
四項協議·····	143
徹底分裂·····	151
內外反應·····	162
組織狀況·····	170

第四章 思潮之爭

爭取主動·····	174
出爾反爾·····	178
啓用中幹·····	186
衝擊上幹·····	190
紅綫主導·····	197
揪劉火綫·····	202

自毀長城·····	207
四派思潮·····	219
愚蠢之舉·····	231
後臺風波·····	233
主動出擊·····	237
聯而不合·····	245
力保戰友·····	248

第五章 全面內戰

爭端再起·····	252
戰歌事件·····	258
革命到底·····	275
炮制六評·····	280
論戰實質·····	292
三大戰役·····	301
神聖同盟·····	302
要求軍管·····	304
鬥私批修·····	307
解放劉冰·····	311
批省無聯·····	314
整紅教聯·····	317
也不高明·····	320
倒謝運動·····	322
形勢逆轉·····	326
冤假錯案·····	329
荒誕故事·····	336

第六章 百日武鬥

特種部隊	340
一四武鬥	342
箭在弦上	345
初戰慘敗	349
四不方針	352
逃難遇難	356
護糧被害	359
戰略決策	361
五卅大戰	369
制造武器	379
冒險突圍	384
解救行動	387
咬牙堅持	392
文攻戰場	395
友邦驚詫	398
血染清華	403
同歸于盡	422
參考資料	432
後記	435

第一章 天下大亂

狂飆驟起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午飯後，我們清華大學工程力學數學系 03 班的同學們照例回十三號樓宿舍休息。在樓梯口，一位同學告訴我：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什麼？》，還廣播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說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等人是“三家村”的黑幫分子，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他對我說：清華也要停課搞文化大革命了，我們班怎麼辦？我吃了一驚：文化大革命？停課？我說：“沒有學校通知，我們照常上課。”當時我是力 03 班的團支部書記。

下午，我們繼續去教室上課，但同學們已經心不在焉了。第二天我們還是去了教室，却没有老師來講課，實際上全校已經停課。大家不知所措，坐在教室裏議論紛紛。據說清華也有人貼了大字報，但說不清是哪個系的同學貼的，也不知道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同學們催我到系裏找領導問清楚下面幹什麼。我找到了班主任，他向我們傳達了校黨委的三條精神：各人可以按中央的方針和自己的理解寫大字報，緊跟中央，中央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矛頭指向黑綫，對學校工作可以提意見；內外有別。

所謂內外有別，就是大字報不要到處亂貼，要貼到樓道內。外單位送來的大字報，一律送到圖書館閱覽室。確切地說，大字報不是“貼”的，而是“挂”的，是挂在圖書

館閱覽室裏臨時拉起來的一排排鐵絲上的。那些大字報主要是批判文化界、教育界的所謂“封資修”，說什麼的都有，我記得被點名批判最多的人是郭沫若先生。

很快，圖書館的閱覽室就不够用了，學校派人在西大操場東邊的三院和強齋之間的空地上豎起很多木樁，拉起一排排鐵絲，讓同學們挂大字報。

後來，大字報越來越多，同學們幹脆把大字報貼在教學樓的牆上。再後來，學校在大禮堂前面的草坪周圍搭起了一圈蘆葦席子，供同學們貼大字報。從此，大禮堂及其周圍的區域成爲清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中心。

最早把矛頭指向蔣南翔的是熱 002 班的同學，他們貼出了《蔣南翔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蔣南翔是我們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兼校長，同時也是我們國家的高教部部長。隨後，指責校黨委是黑幫、蔣南翔是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逐漸多了起來。校黨委看到形勢不妙，便組織了一些幹部、教師和學生貼出許多大字報，力圖證明校黨委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對造反的學生進行了圍攻。學校裏形成了支持校黨委和反對校黨委的兩大陣營。很多人都用大字報表明自己的態度。據說支持校黨委的大字報和反對校黨委的大字報的比例是一萬對七百，占壓倒優勢。

但是，校黨委的做法適得其反。6月4日，自93班的同學貼出了《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繼續反對蔣南翔和校黨委，因爲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大字報上簽了名，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這幾位同學原來是黨支部組織的一個批判“三家村”的七人小組，曾經在校刊《新清華》上發表過批判文章，沒想到現在大火燒到了黨委身上。七人小組在6月2號就寫好了大字報，他們拿着稿子到《解放軍報》社

請求幫助，一位叫宋瓊的負責人接待了他們，并把他們留在《解放軍報》社，修改稿件，上綱上綫，搞了一個夜晚，打出了小樣，準備見報。但上級未批准見報，這才貼到清華園。

校黨委再次組織人馬進行圍攻。有些人喊出了“保衛校黨委”、“保衛蔣南翔”、“反對蔣南翔就是反對校黨委、反對校黨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等口號。整個學校圍繞着蔣南翔、校黨委究竟姓“馬”（馬列主義）還是姓“修”（修正主義）的問題展開了大辯論。

當時，我的觀點很明確：校黨委姓“馬”，校黨委就是黨在學校的代表，祇能保衛，不能反對。因為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救星，對我個人來說，更是如此。

我出身于蘇北裏下河地區興化縣的一個貧農家庭，我的童年是一個苦難的童年。解放前，父母租種了地主的幾畝田，全家過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父親給資本家做過伙夫，母親給人家當過保姆。49年，我的家鄉獲得解放，黨和政府領導農民搞土改，我們家也分了幾畝田。但那一年蘇北發大水，興化是蘇北裏下河地區的鍋底窪，受災最重，鄉親們紛紛外出逃荒。父親搖了一條小船帶着母親、哥哥和我去上海，當時哥哥七歲，我才四歲。開始的時候，父親挑個擔子賣糖粥，母親帶着我拾荒（就是撿垃圾），哥哥留在船上看家。過了不久，父親的糖粥賣不下去，祇好出去打短工，母親拾荒也撿不到什麼東西，祇好帶我去要飯。有時候，父親找不到工作，母親要不到飯，全家祇好挨餓。這時候，母親通常到附近的小菜場去撿菜幫子和魚頭魚尾，拿回來煮了充饑。小菜場經常有人劃“長魚”，“長魚”就是鱔魚，賣魚的人用一根骨針，把鱔魚劃成一

條條的，賣給客人，剩下的魚頭和魚刺倒在盆裏。母親就把鱈魚的魚頭和魚刺撿回來煮了吃。我嫌魚頭魚刺扎人，寧可挨餓，也不肯吃，哥哥聽話，吃了不少，結果那些魚骨頭卡在哥哥的胃裏、腸子裏，疼得他在船上打滾。父母無錢求治，祇有眼睁睁地看着我可憐的哥哥疼死在小船上。哥哥一死，傷心的父母就帶着我離開上海回到了家鄉。

解放初期，黨和政府及時領導了互助組運動，幫助貧苦農民進行生產自救，對於大多數剛剛分到土地而無任何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而言，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互助組和合作化運動對恢復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我的父母自然是互助組和合作化運動的積極分子，我們家的生活得到了穩定，日子一天天好起來。雖然還是很窮，但黨和政府年年搞救濟，我們家總是能得到各種各樣的救濟，錢、糧，還有衣物。

1952年，我們村裏辦了小學，我上了學。從上學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享受着免費教育，直到大學畢業。在清華，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之一，除享受最高的助學金外，上課用的書本，床上的被褥，冬天的棉衣，夏天的襯衫都是學校發的。

從一個農村的苦孩子到高等學府的大學生，從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到預備黨員，我始終在黨的培養下成長。黨在我身上打上了深深的階級烙印。沒有黨，就沒有我的一切。這不是口號，而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實。因此，我擁護黨、熱愛黨，是完全發自內心的。在清華，像我這樣的同學有很多很多。

在肯定了校黨委姓“馬”的同時，我對蔣南翔持保留態度，我說不知道蔣南翔姓什麼。我覺得蔣南翔姓“馬”還

是姓“修”，應該由黨中央說了算，我們無從判斷，因為我們既不了解他的歷史，也不了解他的現狀。我還說，即使蔣南翔真的“修”掉了，清華黨的組織也還是健康的。我們不應該將黨的組織與個人混為一談，我們保的是黨委這個整體，而不是其中的某一個人。

我們年級的黨支部並沒有給我們布置參與辯論的任務，可我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又是黨小組長，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表明自己的態度，而不應該採取消極回避的態度，于是我把我們班的另外兩位黨員召集起來，陳述我“校黨委姓馬，蔣南翔不知姓什麼”的觀點。這兩位黨員一位是系學生會副主席，一位是系學生會女工部長，他們兩人都非常同意我的看法，這樣我們三個人聯名寫了大字報，挂到了三院北面的鐵絲上。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第一張大字報。

6月5日，以劉濤為代表的七名高幹子女貼出了《清華黨委應採取積極態度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雖然他們祇是要求校黨委站到運動的前列，但他們的語氣却是居高臨下的、命令式的。在我們的心目中，黨委從來都是至高無上的，有誰敢于對黨委發號施令？一批高幹子女帶頭反對校黨委，使我們班大多數同學預感到清華黨委可能要垮臺。

6月7日，北大學生楊濤到清華煽風點火，校黨委組織了黨團骨幹分子與楊濤在大禮堂進行辯論，圍攻楊濤，會後強行將他押送回北大。校黨委的這種做法引起了很多同學的不滿，紛紛寫大字報批評校黨委。

6月9日，張際春在高教部宣布：蔣南翔是黑幫，已被停職反省。消息傳到清華，清華立刻大亂，有人說，“蔣家

王朝，頃刻瓦解”。不過，清華的師生員工始終認為，清華黨委不是被群眾運動衝垮的，而是被高教部搞垮的。有人說，蔣南翔不是被揪出來的，而是被拋出來的。事實上，如果不是張際春在高教部宣布蔣南翔停職反省的話，清華黨委及其龐大的黨團幹部和政治工作體系是衝不垮的。其實，在文化革命中，絕大多數單位的領導班子和黨團組織都不是被群眾運動衝垮的，而是被上級領導特別是中央文革搞垮的。

這一階段在清華文革史上稱為“反蔣”時期。這個時期，反蔣的是造反派，保蔣的是保守派。我雖然不保蔣南翔，但是保校黨委，基本上是保守派。

力求理解

6月9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葉林為組長的513人的龐大工作組進清華，罷免學校黨委及各級幹部的官，由工作組代理行使校黨委職權，領導清華文化大革命；這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一派、二罷”。

工作組在各系組建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并指定了各系的文革委員，那些反蔣積極的幹部子弟自然成了工作組的依靠對象，成為各系的文革委員。我們班由一位高幹子女負責，團支部、班委會停止工作，我也“靠邊站”了。

所有因反對校黨委而受圍攻、受壓制的同學得到了解放，他們立刻把怨氣發到各級幹部身上，他們把幹部揪到臺上鬥爭，給幹部戴上高帽子游街，并強迫他們勞動改造。毛主席幾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描述的貧下中農鬥爭土豪劣紳的種種情況，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

不過這次不是在窮鄉僻壤，而是在首都的高等學府。

從六月九日工作組進校到六月二十三日這段時間，在清華文革史上是所謂“鬥黑幫”時期。後來《紅旗》雜誌調查員對這個時期的清華有個形象的描述，叫做“游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

這個時期，我和我們班的同學基本上處於觀望狀態。但我本人生性好動，對運動非常關心，認真閱讀報刊文章，到處看大字報，我力求理解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從內心講，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基本上是贊同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65年學校黨委組織《九評》學習，開展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教育，要求每個人聯系自己的實際情況，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滅資興無，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九評》學習給我的教育最深，我就是《九評》學習後入黨的。我擁護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教育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覺得應該自覺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去，經風雨，見世面，爭取做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當時我就讀于清華大學工程力學數學系計算數學專業，我們這個專業是理科數學專業，有幾門課程是我們一個班單獨上課，這幾門課程本身就比較難懂，而任課老師講課時常常是抽象概念一大堆，公式推導滿黑板，許多同學跟不上，有些同學幹脆就聽不懂；老師布置的作業又多又難，有些題，全班沒有一個人能做出來；期中、期末考試不及格的比較多。還有的老師在課堂上過多介紹數學家的生平和趣聞軼事，班上同學們意見

很大，說他宣傳成名成家思想。66年2月份的時候，我們團支部和班委會根據同學們的要求，多次組織全班開會，提出了許多意見，要求系裏改進，有些同學甚至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號。年級黨支部和系裏都很重視我們班的情況，到我們班上開座談會，分別找了許多同學徵求意見。後來這件事反映到蔣南翔校長那裏，蔣校長基本肯定了我們班的意見，但是他要求我們不要再提“教育革命”的口號，說“革命”兩個字的含義太大太重，提“教育改革”比較恰當。

文化大革命從文化和教育戰綫入手，引起了我和我們班上許多同學的共鳴。按照最初的宣傳，我們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是思想文化戰綫的革命，當然也包括教育戰綫的革命，沒有想到後來竟演變成了涉及一切領域的政治大革命。

我在努力想：清華修在哪裏？“黑幫”黑在哪裏？所謂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綫體現在什麼地方？外校同學到清華參觀時間得最多的也是這些問題。當時我祇認識到兩點：

一是清華鼓勵我們成爲“雙肩挑”的知識分子，強調“聽話出活”，其結果是引導我們成爲祇管奮力劃船，不管前進方向的政治庸人，容易盲目地跟着野心家走上修正主義道路；

二是清華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生活、體育、文娛等條件，使我們生活在象牙塔裏，脫離了中國的工農群眾，忘記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逐漸變成了修正主義苗子。

可是，說清華黨委也像北大那樣，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全校幹部從上到下都是“黑幫分子”，連許多教

師和政治輔導員也成了“黑幫爪牙”，昔日的師長，居然都是黑幫分子和保皇派，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我心目中原有的政治坐標一下子全都坍塌了。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兩位政治課的青年教師，因為他們曾經在全校大會上發言批駁過反對校黨委的學生，所以“民憤”較大，一開始就受到衝擊，有人把他們關在圖書館一樓的辦公室裏，強迫他們寫檢查，天黑了，也不讓他們回家。辦公室外面擠滿了看熱鬧的人，不時還有“老實交代”之類的呵斥之聲。

一些學生們拉着各級幹部戴高帽子游街。我們系有位一年級的團幹部叫孫秀，她是從農村來的同學，非常質樸，就因為她是學校樹立的優秀團幹部的典型，居然也被一些同學揪鬥游街。也許是兔死狐悲吧，看到孫秀挨鬥，我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

我確信，我們搞文化大革命，我們要反修防修，但決不是針對大多數幹部、教師的。我們反修防修的概念不都是這些幹部、教師灌輸給我們的嗎？不正是他們教我們科學社會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正是他們教我們滅資興無、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他們是黨的教育工作者，無論他們有什麼錯誤，也不能與舊社會的土豪劣紳相提並論，決不能用土地革命時期農民揪鬥土豪劣紳那樣的辦法來對待我們學校的幹部、教師。

中間偏左

工作組進校後首先把清華所有幹部都趕“上樓”，要求幹部人人檢查，檢查過關後才能“下樓”，并要求幹部“層

層剝皮”，先揭發基層，後揭發黨委，一層一層往上追。工作組認為清華黨委是黑幫，自然對清華的幹部採取排斥一切的做法。

工作組進校後的第二步是恢復正常的秩序，試圖把亂揪亂鬥的學生們拉回課堂。工作組員下到班級，組織同學們學習文件和社論，提高思想認識。

但是部分同學不願再受束縛，照樣我行我素，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揪鬥幹部。

工作組不同意學生們揪鬥幹部並將幹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組組員批評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學生覺悟太低，沒有政治頭腦，是一群烏合之眾。

不久，就有部分同學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的清規戒律和條條框框，說“工作組不可信任”、“工作組大方向錯了”。

6月16日，工程化學系化92班學生蒯大富等人貼出《工作組往何處去？》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壓制了群眾。

工作組和部分同學之間發生了尖銳的對立。

我們班比較聽話，工作組安排我們學習、討論，我們都照辦。我們一般都是晚上去看大字報，了解情況，既沒有人參加揪鬥黑幫，也沒有人反對工作組。

6月19日，王光美來到清華，在群眾面前公開亮相，說是“少奇同志讓我來看大字報”的。她表示願意參加清華的文化大革命，並成了清華工作組的成員。王光美的出現引起了全校的轟動，大家都很好奇，我們一聽到信兒就奔跑過去圍觀，為的是一睹國家主席夫人的風采。

清華學生當中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層出不窮。6月21日，蒯大富首先提出了要向工作組奪權的問題，他在大字報上的批語中寫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

在校黨委手中，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中，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在一片反對聲中，工作組不够冷靜，錯誤估計了形勢。他們認為清華右派學生正在向黨奪權，必須加以反擊，并且提出了“反蔣（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口號。

6月24日，工作組召開全校辯論大會，并組織部分同學圍攻蒯大富。辯論中，擁護工作組一方的發言漏洞百出，十分被動。工作組組長葉林不由分說，自己走上講臺，指責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是一種反動行爲。他要求全校同學表態，要麼站在蒯大富一邊，要麼站在工作組一邊。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也跑上講臺說：“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

工作組的做法不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反感，同學們紛紛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

我認為蒯大富寫的批語和大字報，祇是表明他對工作組的不同意見，雖然他說要從工作組手裏奪權，但祇是說說而已，并没有什麼實際行動，不能以言治罪，算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工作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亂扣帽子。所以，當晚我也貼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不同意工作組將蒯大富打成反革命。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貼的第二張大字報。我們班一共30人，有26人貼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足見工作組在6.24辯論會上的表現多麼拙劣、多麼不得人心。特別是周赤萍“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那句話，在學生中起了極大的負面作用。毛澤東思想是神聖的，你小小一個周赤萍怎能代表得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工作組開始向群眾傳達北京新市委第

一書記李雪峰以北大“6.18事件”為依據所做的6.23報告，報告認為“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高校存在右派學生向工作組奪權的暗流，要求工作組堅決頂住，並提出了“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的口號。

所謂北大“6.18事件”是指6月18日北大化學、生物等系學生趁工作組全體組員到教學區開會之際，在學生宿舍區自發組織鬥爭了40多位正和同學們一起學習的教師、幹部和兩名學生幹部。北大工作組及時制止了學生的行動。當夜，北大工作組給中央寫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簡報認為這次事件的發生“主要是有壞人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

6月19日，劉少奇以中央名義轉發了北大簡報，並加了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1]

毫無疑問，清華工作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製造了圍攻蒯大富的“6.24事件”，也正是工作組靠傳達李雪峰6.23講話才扭轉了被動局面，平息了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浪潮。從此，清華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進入了長達20天的“反蒯”時期。在“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無限信賴工作組”等口號下，工作組把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了學生群眾。

清華的運動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薄一波副總理兩次來清華看大字報，第一次碰見了蒯大富並與他進行過辯論，第二次說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

中央文革小組派王力、關鋒到蒯大富的宿舍與他進行過長談。